

丁 慰 慈 回 憶 錄

(一)

五湖四海恣遊賞·美景良辰且放歌

● 丁 慰 慈

吳敬恒講演任記錄

一九九五我年八十，每日仍以不斷寫作、修飾稿件和蒐集、整理資料為樂。英文如有疑義，不辭苦翻字典。我相信，學術界耕植更深，像我這樣以讀書為樂的人一定不少，但我在生活上有無其數的『奇遇』，可能在世界上找不出相同的例了。許多異數，徒興山河之悲，那真是『五湖四海恣觀游，遊點不多淚點多』了！

我十二歲時，八年內已將唐詩三百首和四書五經讀完，但過程不是背誦，而是祖父的講解。家中也無字典，祇是口授心記。

初中是在離家鄉貴州貴定六十公里的貴陽，校址在南明河上的兩江口，大禮堂的羅馬教堂式，甚為壯觀。上下學須由可容二三十人的木船往返，兩岸綠草如茵，柳枝夾道，綺麗的風光，倍增讀書的樂趣。

貴州夙稱山國，交通不便，與鄰近省區四川、雲南、湖南、廣西的往來也不多，和沿海淞滬江浙廣東更為隔絕，因此蔣中正委

員長第一次到貴州省視察，曾先請吳敬恒到貴陽『暖身』，作個文化之旅。

吳敬恒佐孫中山革命，致力於北伐前文化啟蒙的工作，國人盡皆知曉。吳敬恒到了貴陽，輿論界大為哄動。由於我們的學校風景秀麗，禮堂壯觀，因此全省教育界請吳氏講演時就選定那貴州南明江上的中學（當時貴州尚無大學）。

彼時我在畢業班，負責學生會兼編校刊，因此吳敬恒的講演，便輪到我和耿心泉同學為記錄。吳氏的『純』無錫口音，在聆聽時真令我們為難。我們憑一點國學基礎，真正是『聞一以知十』。次晨，我們將『拼湊』出的記錄稿親送到吳氏的寓所『中山公園』，他欣然接受，要我們隔日去取，次晨他將稿修改完畢交還，我們所記的大略還保留三分之一，三分之二是他另寫的。

我們不會錯過此黃金機會，送稿後即將先準備好的宣紙送出，求吳敬恒墨寶，他立即展紙濡墨命筆，給我的篆書是『雨後山光滿郭清』，給另兩同學的是『月在上方諸品

靜』和『半潭春水一房山』，下款是『弟吳敬恒時年七十有一』，我們十分高興，但心中不安，問他何故寫『弟』？他回答『這是中國規矩』。

由於世變頻仍，以後吳敬恒所住的地方，我都去過：重慶、南京、上海、臺灣計共八處，這是吳敬恒的貼身秘書陳凌海、儲復興所不及我的了。至於吳氏寫給我的六封信，出版的吳敬恒全集均已記載，不多贅。

汪精衛吐憤懣之言

汪精衛所執筆的國父孫中山遺囑，語意簡明，文法緊密，表達孫中山的政治理念，通篇一字不能增減，公認為史家之筆。他對眾演講時輕重疾徐，能處處集中聽眾的注意力。且衣著考究，丰度翩翩，是一個政治人物的偶像。辛亥革命前夕，謀刺攝政王，賦『引刃成一快，不負少年頭』詩，為革命史上名句。民國二十九年離戰時陪都重慶出亡河內前夕，在南溫泉發表他最後一次演說，全校師生凝神恭聽，而講詞內容則無任何精

彩處，但講詞結論卻是他畫龍點睛之筆，汪說：『兄弟今天所報告的一字一句，都是總裁（指蔣中正）所批准的，總裁所未批准的，兄弟不敢講』。彼時其胸中的苦悶、壓抑、憤懣之情，已在這幾句話中，吐露無遺。其後亡命河內組織偽府的原因，已隱約可見。抗戰勝利後，蔣中正總裁無論在文字或口頭上，從未提汪氏叛國乙事，可能也是領袖對這一樁公案的反省。

抗戰時期文人清苦

民國二十九（一九四〇）年我離校，任軍事委員會同少校編譯；在成都候命時，無事可做，中央大學友人陳明道、粟壽初，約我到『未名書店』租書。這家書店多是世界名著的譯文，以及中國夠水準的舊小說。租價低廉。特點是，書店主人不僅藏書豐富，且對文學史如數家珍，借書人虛心求教，書店主人都會對名作家的代表作為簡單介紹，使嗜好文學作品者對欣賞名著有一入門處。我在不到一年內，將俄國名著大部分讀過。此對我日後在伊甯請老師教讀俄文原著時為助不少。有一次我和蘇聯領事閒話，無意中提到普加卻夫（俄國的黃巢）的名字，曾使他大為驚異，認為我對俄國歷史的博學。

我高中時代曾為我的堂兄丁哲明編『新黔日報』副刊，（總編輯為不久前卸任的監察院副院長馬空群）。其後，正式編『貴州晨報』副刊。彼時，抗戰初起，京滬名作家

蹇先艾、謝六逸、李青崖，紛紛返黔，在晨報副刊辦『每週文藝』。那時跛一足的東北作家『齊同』曾對我說，你們雖無稿給，每週請作家吃一頓飯也好——可見抗戰中逃難時文人之清苦。

此事為時甚暫，但我因服務外交部亞西司的關係，不祇是和上述名作家多有接觸，後來在重慶、莫斯科，也曾與郭沫若、茅盾（沈雁冰）這些人來往，諸如為他們辦護照，赴旅館代表大使館致候之類。茅盾在莫斯科曾送我簽了名題上字的好幾本著作，我一直保留到經西歐離港返臺時，才將這些紀念品，從輪船上毅然拋入太平洋驚濤駭浪之中。以免向情治人員多作解釋。

目睹蘇聯戰後真象

我曾經在迪化、莫斯科，先後陪同蘇聯四任駐華大使共餐。他們分別是鮑格莫洛夫、彼得羅夫、潘又新和費德林柯。其中費德林柯自謂能讀『離騷』，其華語流暢，他的金髮美人的大使太太，談吐風生，尤令人傾倒。民國三十年政府在迪化設『外交部駐新疆特派員公署』，因沈鴻烈的推荐，我被借調由航空委員會擔任蘇聯科，追隨吳澤湘特派員，參加那馬拉松式的對蘇談判。談判結果，我代表政府，曾先後在新疆被蘇聯非法佔領的（一）迪化紅八團營房（二）獨子子石油礦和（三）頭屯河農具製造廠的移交清冊上簽字接收。是為我在外交界服務中最值得紀念的事。

而其中農具製造廠，就是飛機廠。我由甘肅到新疆，曾經駐哈密的蘇聯紅八團在機場的衛兵檢查，其後我接收他們的營房，也是想不到的。

也因我在外交部駐新疆特派員公署任職的關係，一九四四年四月，奉命送『外交郵袋』到『新邊五館』中的阿拉木圖，阿拉木圖也是中蘇航空公司的邊境站。阿拉木圖是蘇聯的中亞細亞最大的哈薩克共和國的首都，那是鐵幕的大後方，不僅西方人不能去，蘇聯公民亦須具特別任務者才能入境。當時大戰方殷我能到彼處，所以我相信我是全世界外國人真正見到蘇聯在大戰時最後方生活真象的極少數數人之一。

僥倖從死神中逃生

一九三三年，盛世才曾藉蘇聯之助鞏固了政權，一九四一年六月三日，希特勒揮師東指，史達林措手不及，列寧格勒被困，莫斯科岌岌可危，而我方正值長沙三次大捷，蔣夫人宋美齡女士赴美國會演說，盛世才始逐漸傾向中央。因此上述我國對蘇的三大案的解決，主因是出於盛世才的支持。一九四三年二月，蘇軍在史達林格勒大勝，扭轉了二次大戰的局勢，而盛世才也變了心，圖再度靠攏莫斯科。同年的八月十一日，盛世才逮捕大部分由重慶派去新疆的黨政軍工作人員，由於吳澤湘特派員在渝述職，而我是經常與蘇方往來之人，因此我不但入獄，而且

受了八種苦刑。盛世才統治新疆十年，受害的無辜者逾十萬人，我們被捕後，幸而史達林拒絕那反覆無常的小人，未理會盛世才，中央也調他到重慶國民政府任農林部長，我們才僥倖從死神的手中再逃出來（請參閱時代文摘拙著血淚山河新疆行），返渝述職。

駐新疆工作期間，在盛世才的統治下，使我認識共產國家的一個「樣版」，談判期間和總領事館的頻繁酬酢，讓我見識若干次外交宴會的場面，也順便提昇了我的酒量，同時接近若干軍政和學術界知名之士。過去讀史，周穆王乘八駿馬赴瑤池謁見西王母，我曾隨同梁寒操、羅家倫、黎東方在官方安排下，乘馬上天山遊覽那海拔數千尺，蒼松掩映、碧波如鏡的瑤池，羅家倫且賦詩贈我，以紀念天山同遊之盛。半年前，名金石家應公諾問我平生有何最得意之事，願為我刻一章以為紀念，我凝思少頃，立刻寫：「雲海蒼茫立天山」詩句，應君攜鼎彝新君所藏之石，不數日回贈，字體古樸，刀法蒼勁，具漢印味，是極富紀念性的藝術品。

赴蘇聯任三等秘書

抗戰勝利後，我隨外交部遷都，宿舍在日本投降後所遺的「日本大使館」，位於南京鼓樓。民國三十五年（一九四六）我在杭州與劉泰楨小姐結婚，承浙江省主席沈鴻烈福證，猶憶我與泰楨去和吳敬恒辭行時，問我是不是來請他證婚，我答，結婚地在杭州

，不敢驚動先生。稚老說，那我就送一副喜聯給你們好了。他立即自書架上抽出，濡筆揮毫，當時攜走，稚老對我之熱情愛護，畢生不敢忘。

南京隨處是水池，隨處可見持竿者。一日我散步時，見一着長衫之文人，因我初到，見他很悠閒，因隨意閒聊問他這些年在淪陷區的生活情況如何？他出乎我意料之外回答「很好」，我大驚。聆聽他繼續說：「汪精衛在此間時，幣值無變動，糧食不缺，學校未斷課，也沒有中國人參加日軍作戰」。我剛由戰時重慶陪都來，這些話等於為我洗腦。多年以來思之思之，汪精衛或可與法國維琪政府時代的貝當元帥相比擬。

七月在杭結婚，十月，人事處徵求我的意見，希望我到齊桑任領事，齊桑是新邊五領館之一。我想，年紀輕輕，便到那窮鄉僻壤，錢無花處。雖能存儲美金，也打動不了我的心，因此我拒絕了新職的提示。次月，發表我到駐蘇大使館任三等秘書，接著，傅大使乘常便來電催迅即赴任，並隨著電文開了一大筆清單，要我到上海採購。彼時，蘇聯在戰後物資奇缺，常專人到斯德哥爾摩採辦，但中國人許多食品，則非瑞典可能辦，因此，在滬所帶食品，包括兩大袋食米在內，其重量可想而知，新新公司總經理為我帶白米出國，都託為從未見過。我和內子配合船期出發，時值冬令，過對馬海峽後，即見海上漂流大小冰塊，再向北行，即見到那威

力強大的破冰船。我嘔吐不已，但內子則若無其事。到達海參崴時，總領事錢家棟率全體館員相迎，並住在館內。海參崴原為中國領土，但經史大林強制遣送，數十萬華人僅剩下一戶。我因曾到過阿拉木圖，所以深深地了解蘇共的惡行。海參崴既無僑務，更鮮過客，所以總領事祇有整日舉杯澆愁，由於西伯利亞大鐵道國際列車一週祇有兩次，且須事先訂票，所以候了十天才得啟程。

全體館員住使館內

到莫斯科須日夜車開行十二天，車子曾遠過貝加爾湖，亦即蘇武牧羊之地。駛過一片一望無際冰天雪地的西北利亞，所幸沿途都有領館同仁上車送菜送飯，得解寂寞不少。過了烏拉爾山即亞歐分界，景色便完全不同。車自松林和白楊樹的大森林中蜿蜒而過。始驚歎於俄國那無盡的財富。

十二天的日程，費十三天才由海參崴到莫斯科，因日期的改變，大使館竟然沒有同仁到車站照料。我將大量行李現場找工人卸車，臨時在車站附近找一輛大卡車，隨身行李則由內子看守，那天正值MAYON，冷至攝氏零度下四十度。內子穿皮大衣，在車站內，經大約半小時幾乎全身凍僵，她感覺冷氣就像直接透到背部，她若再長一點時間便已無法支持。我和內子坐司機臺，將一大卡車行李駛入館內，對於一個初履異地的旅行者言，如此行程，全館的同仁都大感驚異。

對於一個完全陌生的同事言，館中同事算是相當友善，當我在海參崴與謝子敦交談時，他已將館中大略情形相告。彼時，傅秉常是領袖大使，我的任務是接禮賓司和各館電話，以及答覆各使館文件，文件多是例行公事，由我交洋員辦再行核對。朱士熊都一一告訴，一等秘書陳岱礎也教我許多處理洋文函件的規矩。莫斯科無法租房，大使和同事全部連工友、司機都駐在館內。館位於克魯泡特金巷十三號，鄰芬蘭使館，是帝俄時一富商的大院落，客廳可容百人以上舞蹈。大使館主體連地下是四層，一部分是中央暖氣，廂房則燒柴爐。每家的柴爐每天須用巨木塊一百公斤以上，祇早上生一次。因此館內大院，專門有一工人司鋸木工作，三百六十天不斷，木材堆積如小山，蔚為壯觀。

彼時莫斯科正控制東歐各國，禮賓司常來電話請領袖大使參加一些儀式，傅秉常大使則多半拒絕，說「我豈能為他們去擺場面」，於此可見傅秉常的風骨。傅大使曾追隨伍廷芳，也任過孫中山的英文秘書，所以蔣委員長電館時，都具名「弟中正」。

局勢惡化撤離蘇聯

當時駐蘇的六十多個使館，習慣上都用法文，少數用英文，秦滌清二等秘書管領務，秦太太管俄文，也就是與外交部往來文件，秦太太常對俄員的稿件修改，其文字造詣之深厚可想而知。

我初到莫斯科時，蘇聯對外交團的態度尚稱友好，因此我生第一個男孩時極優待，其後對「同盟國」關係惡化，生孩子付費定為每日美金二十五元，當時三等秘書連寒帶津貼月不足五百元，而妻又因病多住一些時間，所以生兩個女孩的錢均是向大使借，也就是後來陳岱礎大使見我時笑稱的「兩千金」。

一九四九年，局勢日趨惡化，傅大使發表外交部長先離莫斯科（未到任），其他同事也都已先後去歐或赴北美，祇留下我作善後工作，彼時駐蘇十領館（先蘇方迫裁斜米），領館同事，武官處都最後撤離。一九四九年十月二日，蘇聯承認中共，通知我們十月二十六日以前撤離。「廖化作先鋒」，我為總領隊下旗歸國。所留下的人員蘇政府撥了兩節車廂，離莫斯科到列甯格勒轉赫爾辛基，在芬蘭下車時還有名譽領事照料。在芬留了兩禮拜，芬蘭是戰敗國，當時無旅館，由政府分配我住在一海軍上校家。其時，我的長子維嘉三歲，長女麗莎一歲，次女莎莎才四十天，而身上祇餘四百美金。其心情況，其景況可想。所幸乘船到瑞典時，董霖次長將路費發給，薪水則發到十二月底為止。

撤館情況史無前例

斯德哥爾摩有一位在中國傳教多年善華語的一位藍師母，曾對我們多所照顧。世界知名的漢學家高本漢，曾請我到他家喝茶。我自以為國學有基礎，可以作他的助手，不料談到古籍中一些修辭的問題，我還不如他

，便不敢毛遂自荐了。高本漢說話有時自然地用上文言文，我還能接受，但當他以西洋語法剖解中文時，我便祇有甘拜下風了。

高本漢就是瑞典國立東方博物館負責人，展品大多數是他旅華時蒐集的，他逐一為我解說，我則半懂不懂地聆聽。展物中竟有一具石棺，以半世紀前中西交通之難，他竟然運送如此「重器」到北歐，不能不佩服西方學者求知精神之強。我也順便問到合法盜走許多敦煌文物的斯坦因（瑞典人），高本漢不經意地答稱「他還在世」。

斯德哥爾摩位於港灣縱橫的地上，到處是橋樑，燈光掩映中，風景更美，瑞典製鋼、造船稱霸歐洲。一百多年未經過戰爭，家給人足，福利制度由搖籃到棺材，但拒絕其他歐洲人歸化，其情況就和今天的科威特、沙烏地拒絕其他阿拉伯人毫無二致。

外交官安全之所以有保障，是因為雙方有駐使作為人質，其次則須遵外交慣例、國際公法。我們一行人離蘇時，大陸的國民政府已瀕於崩潰，而駐在國「最高當局」史大林又是一個蠻不講理的人，這種撤館情況，國際上史無前例，因此當我們這一群「稀有動物」的政治難民抵達瑞典時，新聞記者蜂湧而至，問長問短，閃光燈此起彼落，心想他們心中不免慶幸我們居然活著出來。過去，保加利亞的主席季米特洛夫，羅馬尼亞的外交部長鮑克夫人，都曾被克里姆林宮毒死，所以上述瑞典新聞記者們對我們這一群人的想法，是不足為奇的。（未完待續）